

一本日记满纸血腥 再现侵华日军暴行

(上接 A3 版)

截获“广田电报”

当记者想进一步查找广田弘毅的电报时,艾瑞克拿出一张纸要记者写中文给他看。记者才写下“广田”两个字,他就连声说“明白了”。并不懂中文的艾瑞克,对“广田”、“东条英机”等中文字眼却非常熟悉,可见在国档案馆的资料中,与此相关的档案何其之多,又何等重要!

“广田电报”在1938年1月17日被美国截获后,破译并译成了英文。1994年9月解密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并在学术界引发轰动。

这份电报起初被部分学者认为陈述的是广田弘毅本人的观点。不过,1998年美国华裔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在考证后发现,“广田电报”中所描述的直接见证人应该是《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而电文的内容则是他所写的一则消息。当然,且不论其中的见证人究竟是广田本人抑或田伯烈,由广田签发的这份电报其内容本身,已经构成重要史料的一部分。当时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将田伯烈的这份“特别消息”报道,亲自签发至日本驻欧美各使领馆,说明日军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暴行,日本政府当时已完全知晓。

面对这样的真相,当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很难从根本上推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关注的人多了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历史真相?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多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来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南京大屠杀史料。资深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John Talora)对她说:“你是第一个系统研究这批资料的人。”

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曾经的合作伙伴与好友已是阴阳相隔。张纯如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而约翰·泰勒也已80多岁高龄,平常已经很少来档案馆,最多的时候一周来两次。本以为当天的采访无缘相见,不料艾瑞克却告知意外之喜:“约翰·泰勒今天就在馆里!”

这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虽然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却依旧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繁杂的研究资料,仿佛他的生命无法与心爱的档案研究割舍。

从1945年开始,约翰·泰勒已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了62年!是一致公认的“国宝级”人物,几乎每一类档案的保管、使用和研究都在他脑中储存着;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能说出名字。也正是从近20年开始,约翰·泰勒明显感觉到了馆藏南京大屠杀档案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从张纯如开始,这种关注度是来自全世界的。”除了美国,还有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的、日本的学者,都曾陆续来馆来过这里查询和研究这批档案。

就在去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还留下了两位来自南京的年轻学者张生、杨夏鸣的身影。从去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他们在这里“泡”了一个月,天天与枯燥的档案为伴,收获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带回国的档案、史料足足拷贝了5个G容量。

在记者赴美前,杨夏鸣教授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时他还特别委托代问约翰·泰勒好。当记者向老人转达他的问候时,泰勒非常高兴,“我很记得这两位中国来的勤奋的年轻人!”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再添新证

侵华日军军医日记证明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

我们接到命令: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日本军医保坂晃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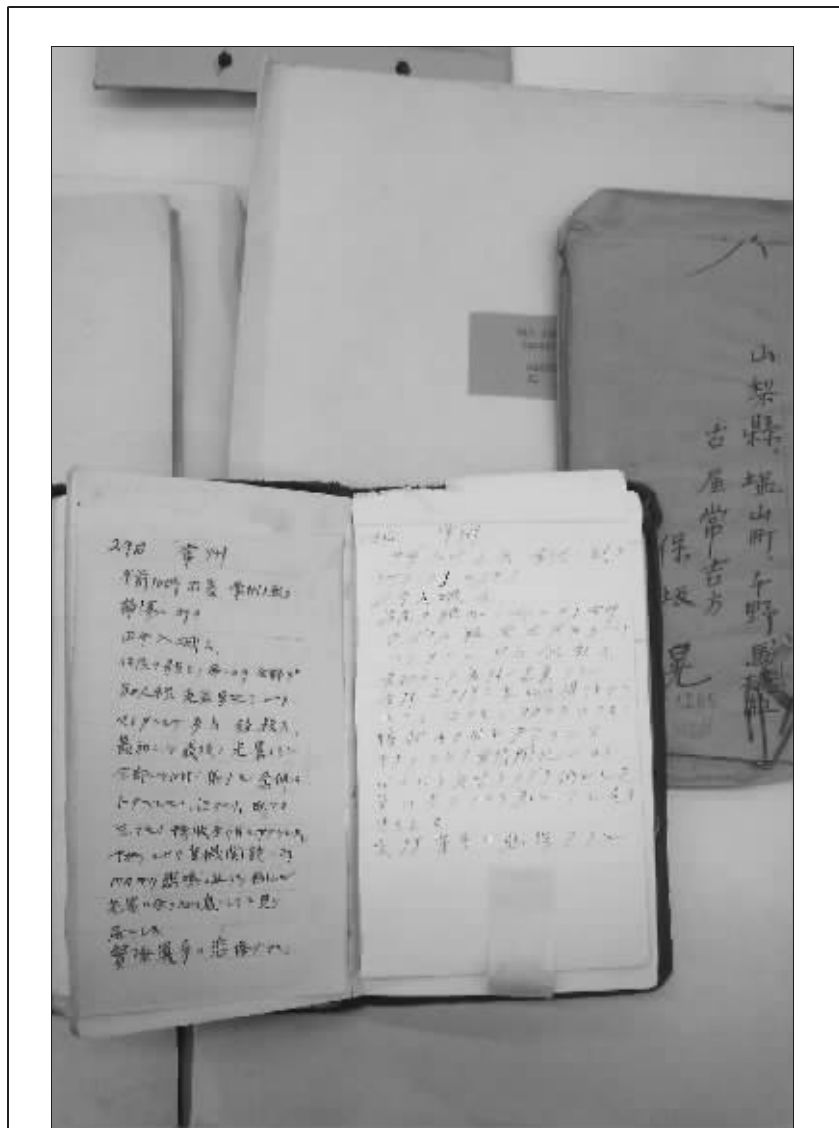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快报记者在众多的史料中有幸与这本日记的原版“相遇”。说到这本日记,不得不提到两件事:一是最先发现它的人: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另一个是官方机构: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简称IWG)。

如今,这本日记已经登上了该机构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



日记本保存得非常完整



日本军医日记明确记载了日军屠杀常州居民一事

快报记者“邂逅”日记原件

当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这本日记的原件时,立即有了完全不同的更加直观的感受:这是一本黑色皮面的日记本,保存得非常完整,纸张虽然略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日记外面还有一个牛皮纸做的信封,上面写着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东京都××日比谷××联合军总司令部法务部长××××大佐殿”。显然,这本日记曾经被邮寄过。

“战争结束后,日记

的主人保坂晃回到了日本。从这个信封来看,他要向驻日盟军告发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罪行。”杨大庆解释说,1945年底,保坂晃将这本日记挂号邮寄给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阿尔瓦·卡彭特。“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后来,卡彭特曾被派到中国专门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但不知何故,这本日记并未在东京审判中出现,而是随同其他档案一起被美国政府保存。

翻开这本日记,记者发现里面有关常州屠杀的那页内容明显有被撕过的痕迹,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过粘贴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日记的主人意识到了这部分内容的敏感性,为了不引起麻烦,他曾经把这页日记撕下来并藏到了一个保险的地方。在准备邮寄的时候,他又将其取出,在另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然后又将其贴到了日记本里。”保坂晃为了这本日记可谓用心良苦。

华裔学者发现日本军医屠城记录

杨大庆,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系的日本史专家、教授。

杨大庆教授在研究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非常关注,也似乎格外敏感。尽管他表示这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有关,但记者却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与他骨子里的南京情结也不无关系。

他的敏感在这本军医日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刚开始发现这本侵华日军军医日记时,IWG的其他研究人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重视,但在我看来,这本日记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内容来看,这本日记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却间接证明了一个事实:南京大屠杀绝不是日本

右翼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屠杀的一部分!

在他的办公室里,杨大庆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这本日记的复印件。



华裔学者杨大庆

美国IWG解密大量日本罪行文件

经过对这本日本军医日记重要性的研究考证,IWG也认识到了这本日记的“特殊意义”,并将其选作《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而这本著作的开篇之作,便是杨大庆所著的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员艾瑞克欣然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对美国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学术领域又多了一部专著,而是意味着对二战日本罪行的重新认识和观念转变。

据杨大庆介绍,1999年1月,克林顿政府成立IWG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该机构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同时,参与其中的还有不少

像杨大庆这样的学术顾问,主要来自各所大学。

然而,IWG起初的研究对象只针对纳粹德国,并不包括日本。后来之所以将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缘自美国国内的多种呼声。例如,美国西海岸众多的华裔人士一直在关注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反响强烈。再如,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再加上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当过日军战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呼吁,美国政府也逐步改变了态度,将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到目前为止,IWG已经解密了10万页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罪行的文件,涉及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等种种细节。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